

# 周信芳往事

■施京吾

## 七岁登台，“麒麟童”名满梨园

记忆中的一位票友，绰号“麒老牌”——先认得“麒老牌”，后才知道有个“麒派”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传统戏刚刚开禁，那时的戏迷能哼一段《空城计》都会让人侧目，而听到《碰碑》的时候更加感喟，像我这样听惯高亢激昂、铿锵有力的“样板戏少年”，从来不知道京剧居然也有如此悠扬轻缓、一唱三叹的调子。

戏迷们经常凑在一起娱乐，“麒老牌”是常客，嘴一张就是《打渔杀家》、《宋士杰》，特别是唱《徐策跑城》，从“湛湛青天不可欺”开始，唱着唱着便进入剧情。

“麒老牌”在戏迷中颇受欢迎，人缘不错，事隔多年，听说他去世了。人老了，总归有这一天。

“文革”十年，可谓恍惚，可能戏迷们早就忘记京剧行腔原理，以为嗓子哑就是麒派，得了重感冒就可以唱裘派了。其实，麒派的特殊嗓音和腔调，一开口非他莫属，不像马派、杨派，总要听一会才能分辨出。大名鼎鼎的“麒麟童”是谁——周信芳，那是他的艺名。

就来说说他吧。

周信芳，1895年生于江苏清江（今淮安），籍贯浙江慈溪。周家在当地曾属望族，只是家道中落，到了父亲周慰堂只是个布店学徒，因他酷爱京剧，便下海入了戏班。戏班是要四处游走演出的，遂到了清江演出并结婚生子，就得周信芳。那时伶人地位低下，周慰堂“下海”之举，引得周氏家族极为愤怒，便把他及其子孙革出祠堂。周信芳身世尚有别传，这里只取其一。

既生伶人之家，耳濡目染，京剧对周信芳影响极大，不过五六岁许，小小周信芳就习得好几出戏，七岁登台，遂得艺名：七龄童。这一登台，技惊四座，令人赞叹不已。

周信芳天赋极高，又身在梨园，多得名家真传，迅即红遍江浙沪。只是因为已超过七岁，“七龄童”的名字不能再用了，于是更名“七灵童”，12岁时于

上海演出，因海报误植为“麒麟童”。从此，京剧界风生水起，周信芳以“麒麟童”名满梨园，“海派京剧”呼之欲出。

此后，周信芳进科班“喜连成”搭班学艺，认识了梅兰芳并同台演出。对他影响颇大的是名伶金月梅，因金能演许多新戏，周信芳对新编剧目尤为偏爱。当他15岁时，嗓子“倒仓”，不能再像其他演员一样挥霍嗓子，这本是戏剧演员的不幸，可周信芳却能悉心专研，博采众长，不仅研习旧戏，在表演和编戏上投入更多。这一逼，逼出一个“麒派”。1928年“麒社”成立，麒派诞生。

周信芳正好出生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时期，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时代。作为京剧艺术家，他显然受到时代变革的影响，算得上“热血青年”，反映在艺术生涯中就是对新编剧目的强烈热爱，且对时代的变迁总是不乏敏感：宋教仁遇刺，他就编演《宋教仁》；袁世凯称帝，他演《王莽篡位》；“二七”京汉铁路罢工，他演《陈胜吴广》；“九·一八”事件爆发，他编演《满清三百年》，逐渐自觉意识到戏剧也要反映“人间意志的争斗”。抗战爆发，身陷孤岛上海的周信芳所演剧目又总与“抗战”有关，像《徽钦二帝》、《明末遗恨》、《梁红玉》等等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周信芳具有准确把握政治风云的天才，不过是一个有良知艺人对社会状况的本能反应罢了。良知失效，本能麻木，便怎么也赶不上时代步伐。

## 建国后重任在身，1959年加入中共

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，周信芳就与田汉交往，1927年加入田汉主持的“南国社”；1932年5月第一次淞沪战争以后，周信芳成立“移风社”；积极开展演艺生活和社会活动，左翼色彩浓烈。上海沦陷期间，他表现出强烈民族大义，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，是当时京剧界进步力量的重要代表。

抗战结束后，1946年初秋，周恩来在上海周公

馆与周信芳初次会面，周信芳与中共关系愈加密切。国民党溃败后，他坚守上海而没有移居香港。

1949年中共建政，由于周信芳在京剧艺术上的杰出贡献，出席了第一届文代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，当选全国文联文委、全国剧协常委，戏剧改进会负责人，稍后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，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。这一荣誉，京剧界凤毛麟角。

周信芳成名早，走南闯北，曾多次目睹并亲身领教过艺人被压迫被欺凌的事件。而新政府给周信芳优厚待遇，一系列重任都压到他身上：上海戏剧改进协会京剧分会主任委员、上海市文联常务理事、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、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。周信芳极重情义，知恩图报，果然不负众望，成绩斐然。抗美援朝期间，不仅新编、演出历史剧《信陵君》，还多次为志愿军发起义演，用以购买战斗机，爱国之心可谓拳拳。

1955年，周信芳出任上海京剧院院长，在京剧界地位日益提高，毛泽东、周恩来都看过他的演出，同时他也日益繁忙，出访、演出、行政，来回奔走，不亦乐乎，并于195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59年4月，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，会议期间，毛泽东看了一出有“海瑞”角色的清官戏，要求有关部门找历史学家研究一下，写点文章。会后，胡乔木回北京找吴晗写了几篇关于“海瑞”的文章，后经马连良要求，吴晗搞出了《海瑞罢官》的剧本；周扬则在上海请周信芳编演《海瑞上疏》。周信芳对党安排的工作自然毫不怠慢，何况早年也演过《海公大红袍》、《海瑞参严嵩》这样的“海瑞戏”。《海瑞上疏》的剧本由许思言执笔，周信芳兼导演和主演一身，经过半年编排，该剧被列为上海“国庆十周年献礼”剧目，于1959年9月30日在天蟾舞台隆重首演。这比《海瑞罢官》早了一年多。

“海瑞戏”的上演确有一定政治考量：历经1957年反右之后，许多人噤若寒蝉，不再敢开口说话，演“海瑞”只是鼓励大家继续“说真话”，表现海瑞不畏强暴，为民请命的精神，完全没有后来批判的“为彭德怀翻案”的意图。安排这项工作，“庐山会议”尚未召开，彭德怀事件根本没有发生，这些艺术家们哪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和胆量呢？

然而谁也没有料到，“海瑞”这个死了380年的历史人物会掀起中国当代史的惊涛骇浪。时代在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变化，像周信芳这样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人，虽然不懂，但也照样紧紧跟随。

随着“大写十三年”号召，艺术家们纷纷投身于现代戏的创作中，周信芳此时虽已年近七旬，也不甘落伍。1963年下半年，为迎接全国现代戏会演，

他主演了现代京剧《杨立贝》。可就在周信芳把这出戏演绎到几乎成经典的时候，却接到“上级通知”，这出戏不准上演，因为“杨立贝”是富农，周信芳艺术生涯中的最后一个角色就此夭折。取而代之的是《智取威虎山》。

1964年春，周信芳和夫人裘丽琳观看《智取威虎山》彩排，江青莅临。江青与裘丽琳在30年代的上海就是老相识，可裘丽琳哪里能知道，此时江青早就不是彼时蓝苹，裘脱口而出：“我们已经有好多年不见了。”一句话，使江青脸色大变。这句正常的招呼，却如周信芳拿手名剧《徐策跑城》里的戏词：惹下了塌天大祸灾。从此，江青对周信芳再无好脸色。她也这样说过童芷苓：“与童芷苓在一个党内，我感到羞耻！”

### 《海瑞上疏》挨批，周信芳在劫难逃

1965年初，江青在上海研究关于“样板戏”的问题，暗中却在酝酿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且竟和周信芳多少有所关联，对此，周一无所知。艺术家的心机怎么也高不过政治家的谋略，周信芳再“进步”，也依然要按照“艺术规律”办事，他反对在现代京剧中给主要演员安排太多的大段唱腔；也反对整个上海京剧院停下所有的戏码，只搞《智取威虎山》一出。可这些意见却不符合“革命需要”，简直就是文艺革命的绊脚石。

是绊脚石就要被踢开，灾祸开始降临到周信芳头上。

1965年11月10日，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姚文元文章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。11月30日《人民日报》全文转载，并且加了编者按。正文这样写道：“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、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，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《海瑞上疏》……”在“海瑞上疏”四个字后面是第15条注释，文句颇长，大意是介绍《海瑞上疏》创作、演出前后的情况。

姚文元的这篇文章，前后写了七八个月，多次通过秘密渠道进京修改，据说毛泽东亲自改了三稿。这正是江青在上海暗中策划的结果。

这一劫，周信芳怎么也躲不过了。

南周北马，一个演《海瑞上疏》，一个演《海瑞罢官》，遥相呼应，配合默契。姚文元一炮轰出，倒下一片，如此“节俭战法”，实乃用兵之道。或许有人问，一篇文章会有如此大威力吗？写在这个时代不一定有，写在那个时代一定就有。血肉之躯如何抵挡得了专政机器？马连良于1966年12月16日撒手

人寰，周信芳比马连良年长，生命力也比马连良顽强，当然，也背负了更多的痛楚。

说到姚文元文章，我仔细拜读过，真是才气逼人，立论、驳论、结论，抽丝剥茧、层层推进；丝丝入扣、滴水不漏，文人气、才子气扑面而来，堪称典范。可好文章全没用到好路上，文章有大致命处，就是“戮心”——立论、驳论、结论，都是为了证明一个从来不存在的事实：为彭德怀翻案。

尾随姚文元文章而来的是对周信芳的批判。1966年2月12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署名丁学雷文章：《〈海瑞上疏〉为谁效劳？》；5月26日接着发表署名方泽生文章《〈海瑞上疏〉必须继续批判》，到了6月份，对周信芳的批判已经连篇累牍。上海京剧院是“文革”的重灾区，八个样板戏中的六出与上海有关，周信芳置身其中，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。他的罪名一大把，一系列惩罚接踵而至，检讨、交代、抄家、批斗、牛棚、游街，无一幸免。

恐怖政治的骇人之处是对生活的直接干预，它肆无忌惮地闯入个人生活领地，不论你小心还是不小心，随时都可能成为专政的对象。这在“文革”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——不但可以干预你的现实生活，还能干预你的历史生活。给周信芳这样的社会名流找点罪名不是手到擒来么。比如周信芳和上海滩帮会头子黄金荣、顾竹轩的来往，给汉奸吴思宝唱堂会。这样的“罪过”不但非比寻常，简直就是不可饶恕。

可周信芳生活在那个时代，上海的舞台都由这些“闻人”把持，他不去那里唱戏如何生存？给吴思宝唱堂会则是被枪押着去的，怎能让一位艺人担起国家沦陷的责任？在大义上，他已经尽力所能。但革命家们的信念是极其纯粹的，革命意志从不考虑环境、历史和社会特征。江青一面竭力抹去自己的历史，一面又毫不留情地追溯别人的历史。

生活成了一种罪。

江青对童芷苓、对周信芳的态度都与她在上海的经历有关。蓝草是一段历史，一段需要用专政手段掩盖和抹去的历史。为此，江青煞费苦心。

**“周信芳不是反革命，我张春桥就是反革命了”**

1966年10月9日凌晨，上海发生一起神秘抄家事件，被同时抄家的有童芷苓、赵丹、郑君里、陈鲤庭、顾而已五家，本来这个名单上还有周信芳和于伶，合计七家，没有抄周信芳的家，是因为“文革”甫一开始，其家就被红卫兵抄过多次，且一直有红卫兵把守；没有抄于伶的家，则因为他家住空军招待所对面，而这群神秘抄家的人正是来自空军江腾

蛟手下。抄家原因，从他们的名字就能看出，无不是30年代上海著名文化界人士，都与江青有过交往。江青通过叶群安排了江腾蛟手下去执行，他们对抄家人员要求“绝对保密”，并且只要书信、笔记本、照片等材料、资料。后来这些“非常重要”的东西——蓝草时期的印记，在江青亲自监督下，由叶群、谢富治亲手销毁。1967年11月，张春桥亲笔批示，18名30年代上海文艺界人士分别被拘留和隔离审查，成为“特务”、“叛徒”、“历史反革命”。

1967年1月16日，周信芳被押在高架轨线修理车上全市游街示众；1967年12月7日，上海市文化系统“文革领导小组”在杂技场联合召开造反组织“打倒周信芳”电视斗争大会——此时的电视，对多数国人来说还是稀罕物，这最先进的技术用到了“革命”的最前沿，令人可叹可笑。1968年4月25日批判贺绿汀时用的也是这一招。

我问过父亲，可知当年批斗周信芳么？答：知道，斗得可怜啊！再问：如何可怜？答：忘了。答得干脆，忘得利害。

历史往往就是这样，再残酷、再荒谬都会被轻而易举地忘却，当真，我们是个容易健忘的民族？勒在历史肉缝里的那道绳索，怎么能够轻易忘却？

1968年11月14日，周信芳被捕入狱，一年之后被释放。他的灾难还祸及家人，儿子周少麟两次入狱，孙女玫玫被吓疯，夫人裘丽琳因惊吓一病不起，于周信芳尚在狱中时去世。这些横祸都没有换来周信芳的重生。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，在是否“解放周信芳”的问题上，张春桥明确表态：“如果周信芳不是反革命，那么我张春桥就是反革命了。像他这样的人，要我叫他同志，杀了我的头我也不干”，“对周信芳，不枪毙就是宽大处理了”。这样的表态真叫周信芳永无出头之日——1974年秋，虽已是“文革”末期，周信芳却被“开除党籍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，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给群众监督。”——如果说这是周信芳“罪有应得”，是因为他至死也不承认自己的“罪行”，徐景贤说：“像周信芳这样的人，是一定会把手榴弹脑袋带到棺材里去的。”

真是条汉子！

1975年3月8日早晨，这位创作、改编、整理、移植剧目达二百余出（其中堪称经典者几十出），为中国京剧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艺术大师含冤去世。

湛湛青天，飘荡着周信芳一缕冤魂。

编辑/月勤